

清溪道与1883年霍西 访清溪县“记事”评介

刘达永

(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)

摘要:英国人亚历山大·霍西1883年春沿四川省古清溪道游历,以及访问雅州府清溪县,其事记于其《华西川贵云三年三次游记事》。对其略作评介,对研究地方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,也可见霍西之关注点和用心与意图。

关键词:清溪道;霍西;《华西川贵云三年三次游记事》

中图分类号:K297.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4)04-0128-07

一次偶然的机会,笔者读到了《华西川贵云三年三次游记事》一书[1]。作者是英国人亚历山大·霍西(Alexander Hosie)。此人于1882、1883和1884年三年中三次在四川、贵州、云南三省游历^①。他将其见闻写成文章,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(RGS)等机构的会议上宣读,1890年整理成册公开出版,1897年再版发行。此书至今仍在流通。笔者所读,是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(NILU)图书馆的藏书。从“借书单”知晓,有数十名(次)读者借阅过这本书,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至2003年春。这些绝大多数应为美国人的读者,居然对120年前的中国西部如此关注,令人颇感意外。展读《记事》,书中所及,和有感于外国人对我国西部历史的兴趣,引发了我对本省悠悠往事的求知愿望。在此先就霍西于1883年春沿清溪道游历,和他访问“雅州府清溪县”(今汉源县)后的“记事”,略作评介。

霍西于1883年(清光绪九年)在重庆过完春节后,即动身前往成都。霍西在成都停留两天后于2月28日晨从南门出发,前往他此行的目的地大理府(Ta-Li-Fu,今云南省大理)。他声称“我们已准备就绪,要穿越中国西部的旷野和落后的边远地区”,他要“经雅州府(今雅安市),建昌盆地(宁远,今西昌市),再经永北厅(今云南省永胜县、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地),而至大理”[1](87页)。

霍西一行^②从成都出发,历双流、新津、邛州(今邛州市)、名山县百丈驿(镇)、名山县城而至雅州府城(今雅安市雨城区)。他在雅安逗留了一天,考察了那里的砖茶生产和贸易。随后路过荣经县,翻越大相岭(Ta-Hisang Ling),到达清溪县,再南行过大渡河抵坪坝(ping-pa,今甘洛县西北坪坝乡)、海棠(Hai-t'ang,今甘洛县海棠镇),再入越嶲厅(yüeh-hsi-T'ing,今越西县治),又过小哨(Hsiao shao)、小相岭关(Hsiao Hsiang ling pass),进入今冕宁县的泸沽镇。3月19日,霍西一行抵达宁远(Ning-yuan)[1](88—114页)。3月21日,继续南

行经盐源城(yen yuan city)入云南永北厅(yung - pei - t'ing),再至此行终点大理府。沿途,他都有所记述。霍西所走的道路中,清溪县城至宁远府城一段,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清溪道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清溪县城至宁远府,古道619里(亦说629里),霍西一行走了12天,平均每天行走五十一二里,一路走马观花。

“清溪道,古道路名。唐自四川盆地通向云南的重要道路,当系在司马相如所开辟的通向西昌盆地一线的基础上,经历代修治展筑而成。起自黎州(今四川汉源县西北),渡大渡河而南,出清溪峡(今汉源西南),溯越嵩河谷,逾相公岭,经今西昌、会理,渡金沙江,南抵云南大姚,再通往大理。”[2](245页)

有关清溪道修筑的历史、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“置清溪关”[3](275页)、“南康公(韦皋)凿清溪道以和群蛮”[4](591页)、清溪道上清溪峡、清溪关今在何处等等问题,本文不涉及。这条道路的历史作用却不可忽视。这条道路曾是历代朝廷通向西南边陲的纽带,官道、军道,沿途有驿站,要地有驻军。它又是商贸之路,各族商贾脚夫南来北往,翻山越岭,足涉幽谷,或相伴而行,或迎头相遇,其情景大可想象。它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民族间沟通的桥梁之一,尽管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(如唐代的吐蕃、南诏)之间,有几次大的战争曾“借道”此路发兵,或在这条道路上的某些地区拉锯争夺^⑤。由于汉武帝着力“通西南夷”,进而有“通身毒”(今印度)的尝试^⑥,和唐太宗视“通西洱(今洱海白族地区)、天竺(今印度)之道”[5](748—750页)为一体,且作出努力,时国人对外开放的意识和行动,令人起敬。

而今,除专业人士外,很少有同胞知道这条道路的历史或存在。人们熟知由成都至西昌、云南的公路、铁路。目前,尚未见到有人沿古清溪道旅行的报道。实际上,它已不是一条完整的道路了。驿站已成丘墟,道路或已被淹没,或已坍塌,或不见踪影。道路因时代变迁而会不复存在,而开凿、修筑这条道路,通过这条道路为社会历史作过贡献的人们,则不可被忘却,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姓名。仅司马相如为开“通西南夷道,发巴蜀广汉……数万人治道二岁”。如有能者以清溪道的修筑、发生在清溪道上的故事为“生活原型”,定可创

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。

二

霍西沿清溪道而行,评介他的《记事》也就从清溪道起点清溪县始^⑦。

霍西于1883年3月6日黄昏到达当时属于清溪县管辖的“黄泥堡村”(the village of Huang - ni - p'u,今荣经县凰仪堡)。3月9日过大渡河离开县境。他访问清溪县的《记事》主要涉及黄泥堡、清溪县城、龙洞小村(the hamlet of Lung tung)、富林和渥洼村(the village of Wa - wa,今汉源县大渡河北岸娃娃营)。

“黄泥堡村位于海拔比荣经城高1400英尺、大相岭顶峰之下(北坡)5600英尺处^⑧。当我们在3月7日早上醒来,大雾笼罩满山。我们越往上爬行,大雾更加厚密。下行到达海拔4800英尺的小关(Hsiau Kuan)^⑨,只见道路两旁积雪很厚,四周白雪皑皑,令人郁闷。岩石上吊挂着巨大冰柱。行走在崎岖道路上,那冰柱仿佛就在你的头顶上。时而听见冰柱下落坠入深渊的声音,它与深沟的急流轰鸣喧嚣声^⑩,交响呼应。随着我们又往上攀登,积雪更厚。海拔相对较低的小关,积雪仅二至三英寸,此地积雪厚达两英尺。深山悬岩边缘的小路上,有堆堆淤泥和冰雪^⑪。早上六点半,我们从黄泥堡动身,直到下午两点半,才登上9366英尺的山顶(应为草鞋坪)^⑫。登山期间,我们享受了两次短暂小憩。站在山颠,一股股强劲的北风猛吹过来。人们紧张,一度无声。无意中,我听见一名护卫队员告诫我的随员:山顶上大声呼唤能阻止风暴。我们继续行走,踏踩在松脆白雪上的脚步声,打破了令人沮丧的寂静。此时此景,令人厌倦。当我在近乎绝望的情绪中拿起一个雪球对准我的小狗一掷,伴随主人的笑声和爱犬的欢乐吠叫,我们急切地往山口南面走去。”[1](98页)

从黄泥堡到大相岭的草鞋坪,为古清溪县的“北行大道”^⑬。大相岭古为邛笮山,是邛人(汉族)与笮人(彝族)的界山,山北为汉,山南为笮。泥巴山口、草鞋坪、背后山等大相岭主要山颠,从东北至东南盘亘交错,有如巨龙。古道上山之北坡一侧,有大关、小关、九折坂^⑭,异常险峻。从黄泥堡至草鞋坪45华里,霍西花了8小时。除大雪因素外,道路

的难行迫使其每小时只能走 5.6 华里。古代达官贵人文士墨客路过此地大都留有楮墨。一文人行过此路的感叹犹在耳边：“始自黄泥堡，遂上大小关，行行九折坂，天路何艰难。或下如无地，或上如无天。……十步八九歇，曲屋如蚁盘。险岩更骋险，下有九重渊。闻声不敢睹，积雾浩重滩。”[6](22 页)又有那些夜宿黄泥堡次日将翻越大相岭的过客，更留下断肠般的诗句。住地昼冽夜更寒，“衾冷怯孤眠”，忽想“关山明日度，愁绝欲华颠”[6](54 页)。还有“万里关山欲断魂”的恐惧。黑发将变银丝与魂将断在山野，虽是夸张之词，路途险峻当是不假。霍西的《记事》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着墨深刻。此时的霍西毕竟年仅 30 岁。也许他不知道有关九折坂为汉朝益州刺史王阳回车、王尊叱馭处的传说。他路过大关(邛崃关)而在《记事》里不见一字。他言及大相岭，而对大相岭称谓的由来、以及它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并未下笔。凡此有深邃文化底蕴的“景点”都是看点。霍西所记 1883 年 3 月 6 日、3 月 7 日大相岭雪景，应是难得的气象资料。

霍西一行从草鞋坪山顶循南坡下山，直奔清溪县城而去。“走到云层消失处，我们俯视而见一块平地，四周山势高峻，长期山洪冲刷形成的道道深谷又把它切割成块。在平地的一块台地上，清溪县城(the district city of Ching - ch' i Hsien)就座落在这里。它地处大相岭山腰，海拔近 4000 英尺(按：实为 1665 米)。这块平地几乎由正北向正南延伸，(城东西门两条溪水清澈潺潺，水源来自山顶四周已溶化的冰雪。城区不大，却十分有趣。从打箭炉(Ta - chien - Lu, 今康定及其以西藏区通行到内地的主要大道(main high - road), 与从云南建昌盆地(chien - ch' ang valley)而至此的道路，在此交汇。在这里，我们与搬运砖茶的脚夫们告别，没有运气陪同他们向打箭炉进发，这很遗憾。”[1](99 页)

霍西很注意清溪县城的行政地位，以“district city”定位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(city)。它更远的历史，如圣钟山下一古城、诸葛武侯在附近筑城，均不必追溯。姑且从《民国汉源县志》之说。从唐玄宗开元四年(公元 717 年)剑南按察使陆象先题奏修置城计算，迄今已近一千三百年。此城“枕邛崃之麓，天然险要”，“东西南三面并临绝涧，惟北面稍平。贞元元年节度使韦皋凿北面，隍堑深关”[6](49 页)，筑土为城。时至宋朝，这里已是物资交

易集散地。宋人郡守余授曾描述黎州(清溪县古称)“蛮商越阻毡裘椎发交错于阰阨”[7]。北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称黎州境内为“蕃部蛮夷混杂之地，元无市肆，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见钱，汉用绸绢茶布，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”[7]。此时“声教文物”亦渐兴盛，城内“玉渊灵泉”即为授业之地。明朝洪武初年，“成都右卫千户朱正，因旧址甃以石，高二丈五尺，周九里七分，计 1746 丈”[6](49 页)。此时的黎州安抚司城已颇具规模。它在鼎盛时期号称“九街十八卷”，城内繁华，文人以“商贾辐辏，汉番络绎，喧沸街衢”[6](49 页)描绘。又由于清溪县山川地险，自古即为经边重镇，使节筹边重兵严戍要隘，官方驿站。故有“西南千里外犹为内地”和“建昌道上小潼关”的美名。不幸的是，它在人祸(明末清初官军与张献忠部、官军与吴三桂残部在此一带大战)，天灾(清乾隆五十一年，公元 1786 年，地震城圯)的双重打击下，元气难复，至嘉(庆)道(光)时期已渐衰败。嘉庆十七年任清溪县训导一职(从八品)的冯镇峦叹曰：“茶马交通事若何？汉唐如梦等闲过，九街三市空游遍，拾得颓垣败瓦多。”[8](82 页)不过，它仍是重地和交通枢纽：“途长通藏诏，邑小杂兵民。”[9](83 页)迄民国时期，清溪县城仅有正街、横街、文庙巷、珠市街、上营盘、下营盘、北关外街，破败依旧。后因县治他迁，公路兴起，“清溪城”更如夕阳。笔者曾在十余年时期内，多次乘车从清溪镇旁经过，远远望去，能理解“汉唐如梦等闲过”的感叹。它何时再现辉煌？

霍西所说通藏大道，正是从成都至打箭炉远达拉萨的官方大道。1886 年黄沛翹所撰《西藏图考》明确记载：“自四川省城至打箭炉十一站，计程一千零二十里”，“在清溪城五里的羊圈门分路，出南门走建昌，出西门进藏”[9](83 页)。清嘉庆《四川通志》亦有同样记载。两者都详记驿站之间的里程和沿途重要地名。1904 年已是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的霍西，由成都经乐山、峨眉山、金口河，从清溪县东部蓑衣岭入县境，溯流沙河而上，在石碑坎与川藏大道会合，走川藏大道经泥头驿(今汉源县宜东)、三交城、化林坪、冷碛、泸定抵达康定，“了却”他在 1883 年未能去康定的一桩心事。此时的川藏大道仍然畅通。而今人们多只知川藏公路由成都经雅安、天全翻二郎山去泸定、康定、拉萨。公路通车前的川藏大道确已成为历史。

霍西下山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少数民族村庄。

“从清溪城往南行下山,走到陡峭绵亘山脉的底部,那里有一溪谷,满目块石和卵石。溪谷延伸而渐窄。在距城内15英里(24公里)处,道路突然下降200英尺,一条宽阔的河谷展现在我们面前,往下远眺,龙洞小村可见。村庄周围的小块土地上黄色的油菜花、青绿的小麦和罂粟花(poppy)竞相争艳。它是这一片白色河谷中真正的绿洲沃土。海拔下降不仅使我们通向一个新的地区,也使我们走近一块新的民族聚居地。”

“在龙洞村,我注意到人们的面部特征。他们与汉族的区别明显,妇女尤甚。他们的脸庞较为瘦削、形尖,前额突出。毫无疑问,他们身上流着异族、可能是西蕃(sifan,即藏族先民)的血液,他们是混合人群。所有非汉族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,即妇女是最后放弃原本民族服饰的人群。妇女们顽强地依恋其珍爱而丰富的装饰。龙洞村的妇女以其丰富多彩的银质装饰品向人们展示,以加强她们的面部差异性。”

“龙洞村以南不远处,乱石荒野没有种植。我们深入观察,发现一些人工标记:有被集中一起的石头,小块土地上的堤坝,为灌溉目的而改道的溪流。在清澈的水中,野生水田芥(watercross)长势良好。树木稀疏。我们目睹了桑树、桔子树、红枣树、梨子树等果树。桔子树较高,树枝上挂着小而圆的果实,果皮厚而有皱,它们似乎强烈地提醒我,这是小小的‘佛手柑’。河谷里也生长着少量棉花。许多房屋的屋顶用薄石板扣压,而不用汉族常用的瓦盖房子。坟墓由涂有白色的园形石墩复盖。”[1](100页)

霍西对此着墨不少,他的兴趣可见。1904年8月14日他再次访问了此时只有约十间房屋的“龙洞营”(Lung tung ying,即1883年的龙洞村)。龙洞营是古代主要分布在流沙河流域的十三营之一,下文提到的“渥洼营”也是其中之一。龙洞村位于小关子与兰家营之间、小关子南约三华里处。清溪城至龙洞村约48华里,此与霍西所说15英里略同。3月7日,霍西在大相岭饱受冰雪洗礼,下山行48华里就身处油菜花盛开的龙洞村。山上山下气候迥然不同。清溪城三冬冰雪互结,汉源街(今九襄,海拔1300公尺)“桃李二月华”,富林(今汉源县治,海拔782米)一带“桃李正月华”。1883年3月8日,清光绪九年二月初一,靠近富林的龙洞村油菜花开确

属真实。

龙洞村的村民是何族属?仅凭霍西所述难以定论。上世纪80年代初,龙洞村所在的富泉公社有彝族92户、543人[8](18页),可供参考。追溯远古,清溪县为汉朝西南夷中“笮都夷”居住地。汉置郡一“主汉民”,一主“外羌”^⑧。后渐有汉民移居此地。“明初秦楚填蜀,……接踵而来,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十居八九”,自是“境内夷汉杂处”[6](205页)。有清一代,又有汉民移入。康熙时境内户籍仅1071人,迄嘉庆四年(公元1800年)男女增至40159人。“熟夷、生獠与吾民比屋而居,连畦而种,民生其间其居处也”[6](5页)。汉夷长期相处,互市互利,文化交融,彼此通婚,属正常历史现象。旧志称“道光十三年(公元1833年)土司灭后完全汉化”[6](205页),与霍西所记相左。事实上,清雍正八年改黎大所置清溪县时,辖境内沈边长官司、黎州土百户、大田副土百户、松坪土千户四土司,其中沈边长官司在宣统三年(公元1911年)才改流。至今汉源县境内仍有少量彝、藏族居民。

霍西告别龙洞村后,来到他清溪县之行的最后一站:“要塞城镇富林”(the garrison town of Fu - lin)和大渡河北岸重要官渡“渥洼树”(Village of Wa - wa,今娃娃营)。他只提及富林“位于大渡河北岸不远处”,有一条通往打箭炉的马道(bridle - path)^⑨,以及“镇子附近有少量已耕地,这里的农耕极为困难”。其注意力再次转向少数民族。富林以南有一条水渠通往“简陋的、修建在沙洲上的渥洼村。这儿繁茂的仙人掌灌木成片。澄澈的大渡河水向东奔流,冲刷卵石河床。由于多年冲刷,东南山脉已形成了一道峡口,几条岔流连接渥洼村的西边。”

“我们一行来到大渡河摆渡口^⑩。在这里,我们面对着纯粹的非汉族民族,一群船工。船工们个子很高,其中一位小伙子高逾6英尺,修长而结实,有一对直射的灰色眼睛。他们友善地待我,把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。他们是西蕃人,说汉语带有明显的外族口音。其中一人大胆地问了我一些问题,而汉人不会这样(impossible in a chinese),态度躬谦,回问敏捷。……当我在河的中间用竹竿测量河的深度时,西蕃人笑了。”

“渡河之后河南岸一英处,墙镇大树堡(the walled town of Ta - shu pow)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儿帅而高大的男人与生气勃勃的妇女,显示他们为非

汉民。这可毫无困难地与汉族划分。妇女带上时髦的白头巾,向一边倾斜,优美,呈自信状。大渡河可视为西蕃人与彝族(Lolo)的分居线。河北为西蕃人,河南为彝族人。……我发现少数西蕃人住在大渡河以南,失去了与其各自部落的接触。”[1](101页)

霍西在清溪县境内费时两天,行程110华里。他对县城寥寥数笔,对他的必经之路、有名的物资集散地汉源街只字不提,却不惜笔墨地记述少数民族,他的观察重点已非常突出明显。其意图也不言而喻。

霍西对大渡河要津“渥洼营济渡”的记述,值得译出。“每年,这里的大渡河两岸都有一派繁荣景气。四月末,数以千计的搬运工在这儿的渡口过河。他们将来自建昌盆地的珍贵白蜡(white wax insects),运送到嘉定(chia - Ting,今乐山)。他们争先恐后地依靠摆渡过河,在此滞留十分有害。我们在3月9日横过大渡河,时间早于四月末,未能目睹那些脚夫不分昼夜兼程、络绎不绝的壮观情景。……来自南方的铜、松木板,与来自北方的棉花和盐,在渡口相遇了”[1](102页)。这里确是物资交流的要津,清溪道上的“咽喉”之一。

霍西于3月9日过河后,经当时属越嶲厅管辖的大树堡,履山坡陡绝的晒经关,至平夷堡(今汉源县平等乡),涉险清溪关(今汉源县河南乡大湾村观音岩),3月10日到达与清溪关毗邻的今甘洛县坪坝乡,3月11日继续南行。

三

120余年前,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西部畅通无阻,并非仅因中华民族的雅量。它是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产物。1858年6月26日,清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,中英在天津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,其第九款为:“英国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、通商,执照由领事官发给,由地方官盖印。经过地方,方饬交出执照,应可随时呈验,

无讹放行;雇船、雇人,装运行李、货物,不得拦阻。”[10](97页)中俄、中美、中法之间亦订有《天津条约》。霍西进入中国沿清溪道游历,未遭任何拦阻。在霍西之前已有外国人深入到清溪道沿线活动了,有的人如巴伯(Baber)、霍奇森(Hoagson)还调查比较了紫打地(Tzü - ta - ti)^①、泸沽、坪坝三地“西蕃人”的语音区别,以及瓦山(wa - shan)、马边、海棠三地彝族的语音差异。自《天津条约》之后,各色外国人大摇大摆地涌入我国。国人有无相应的“条约保障”前去英国等国“游历、通商”?彼时国之弱,又见一例。

霍西于1883年“春游”到了云南,中国西南边疆要地。从汉武帝始,中国就欲经云南与身毒(今印度)等国通好,以后各朝代一直注意与邻国交往。霍西的云南之行,似与通好无关。早在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战役之后,英国就蚕食式地把印度最终变成为它的殖民地。1824和1852年,英国两次入侵缅甸。1885年它占领了缅甸全境,将其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,严重威胁中国西南的安全。霍西的《记事》首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、不列颠联盟(BA)、曼彻斯特商会(MCC)的专门会议上宣读,不会是偶然的。英国人的眼睛已经盯在这一带地域了。

霍西的《记事》为游记作品,但对研究地方史有一定参考价值。他在字里行间时有贬低汉族之言(他称之为“Chinese”),在与他族的比较中其褒贬分明,前文已有几例。他甚至恶意攻击汉族:“在汉族人中,他们有不道德的邪恶名声”(Amongst the Chinese they have an evil repute for immomlity)[1](102页)。中国的汉族,英文本可用“the Hans”或“the Han people”表达,霍西却用“Chinese”一词。“Chinese”是指包括中国所有56个民族的人民,中国人;霍西则专指汉族,别有用心。由于20年后他是英国驻成都的总领事(Consul - General),他的这些观点更加有害。阅读《纪事》,我们与外国读者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

注释:

①霍西(1853—1925年)是一位“中国通”。1904年夏秋,霍西又从成都出发,南下嘉安府(今乐山),经峨眉县、峨眉山、金口河,过蓑衣岭入清溪县,往西北行经泥头驿(今汉源县宜东镇),由飞越岭出县境,去泸定至打箭炉,再去宁静山一带活动,返

- 回打箭炉后经过懋功厅(今小金县)、灌县(今都江堰)回到成都,为时达三个月之久(1904年7月28日—10月28日)。此时的霍西是英国驻成都总领事。1905年8月,他将这次游历的见闻成文,出版了题为《霍西先生1904年中国藏区东部游》一书。霍西还写了《关于四川省的报告》、《四川:它的生产、工业和资源》、《满州:它的人民、资源和近代史》,以及有关中国鸦片生产,中国地理、商业、工业等方面的书籍。
- ②霍西的随行人员有保镖、轿夫、行李搬运工、勤杂人员以及译员,霍西本人初通汉语。
- ③唐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如南诏、吐蕃的几次战争发生在公元751年、752年、754年、756年、757年、779年、830年,860年后又有南诏“四犯西川”之战。
- ④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:“元狩元年,……使间出西夷,西指求身毒国,至滇……黄能通身毒国。”
- ⑤贾大泉主编《四川历史辞典》,四川教育出版社,1993年7月第1版,第318页《清溪关路》条目以成都府为清溪道起点。又,清溪道之称始于唐代,清溪县县名在清雍正八年(公元1730年)问世。两者不同。
- ⑥黄泥堡为大相岭北坡的一个村庄,历史上它是一重要的关卡和哨所。“明初置黄泥堡,属大渡河官军戍守,又拨太平堡兵戍。清乾隆四十一年设外委一汛。宣统中裁撤”(《民国汉源县志》第44页)。“汛”,为清朝绿营基层组织。汛的人数不一。此处有外委千总一名(正八品)、马步战守兵49名。它也是川藏大道上的一个驿站。道光中开设市场。民国时期阴历每逢二、五、八为市场集期,俗称“赶场”。
- ⑦小关:“两山夹峙,中通一线,北来梯蹬而上,险隘异常”(《民国汉源县志》第44页)。
- ⑧英文原文为:the ain of roaring torrents。见[1]98页。
- ⑨淤泥与冰雪相混,是行人走动所为。在3月6日夜宿地,霍西遇见一群从云南运货经大相岭南坡而来的脚夫。
- ⑩草鞋坪,海拔2900米,旧为黎雅古道必经之路,过此岭的行人多在此换草鞋而得名。(见《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》第152页)
- ⑪“北行大道”,指由县城北门起,经王建城、盘脚、二十四盘、草鞋坪、九折坂、三大湾、老寨、板房、大关、根岩、偏岩、小关、土地桥、周公桥、黄泥堡、界牌,在安靖阻与茶经县交界。(《民国汉源县志》第185页)
- ⑫大关,又名邛崃关,以邛崃坂而名。山岩阻峻,萦纤百有余里。关凿西麓垂尽处。山有九折坂,路艰难,登者回回九折得上。诸葛亮“定南中”过此地,曾有庙。明朝状元新都人杨慎(升庵)受贬于云南永昌卫,曾两次路过此地,留下诗句。清雍正之弟果亲王亦有一首诗传今:“奉使抚西戎,严冬登相岭,古人不朽名,千载如斯永。”(据《民国汉源县志》第22页)
- ⑬明谭希恩:《四川土夷考》称此地为“古西南夷笮都地。汉平西南夷以笮都为沈黎郡、寻罢郡,置东西两部都尉,一治旄牛,主外羌,一主汉民,并隶属蜀郡”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1990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,史部地理类史255—458页。
- ⑭《民国汉源县志》:由富林场到顺河乡路前行,即为通康定的马道。大致沿今富林至石棉县公路方向行,至石棉县后仍溯大渡北岸而上,去冷碛、泸定、康定。但此路难行,常不畅通。(190—191页)
- ⑮此为官渡。《民国汉源县志》:清溪县“治南75里,大渡河为建南出人要肆。水急滩险,过客呼为阎王殿。乾嘉以来旧例,自四月朔至九月底,此岸在太平沟或万工场济渡;南岸在临河堡。自十月朔至三月底,在渥洼营(俗讹娃娃营)济渡。过横河南北,旧设渡夫四十名,其口实建昌邑道署有常款。由宁远府请领转发县中”(197页)。
- ⑯Tzu - ta - ti,如译为紫打地,则它为今石棉县安顺场;如它是“指大地”,则它为今汉源县市荣乡附近。笔者存疑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Ssu - ch'uan, Kuei - chow, and yün - nan By Alexander Hosie, MA., F. R. G. S. Second Edition Reprinted By Ch'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, Taipei, 1972.
- [2] 辞海:历史地理分册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2.
- [3] 欧阳修等撰.新唐书·韦皋传[M].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4] 曹学佺.蜀中广记[M].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5] 顾祖禹.读史方輿纪要稿本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.
- [6] 民国汉源县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1992.
- [7] 乐史.太平寰宇记[M].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8] 四川省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.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[M].1982.
- [9] 西昭图略·西藏图考[M].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1982.
- [10] 王铁崖.中外旧约章汇编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57.

Qingxidao and Comment on Hosie's Account of His Visit to Qingxi

LIU Da-yong

(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, Chengdu, Sichuan 610068, China)

Abstract: Alexander Hoise, an Englishman, visits Qingxi County, Yazhou Fu while touring along the old Qingxidao in Sichuan Province, the tour recorded in his *Hua Xi Chuan Gui Yun San Nian Sab Ci You Ji Shi* (Account of Three Tours to Huaxi Sichuan Guizhou Yunnan in Three Years). It is of some reference value, and reveals Hoise's concern and intention, to make a comment on it.

Key words: Qingxidao; Hoise; *Hua Xi Chuan Gui Yun San Nian Sab Ci You Ji Shi*

[责任编辑:李大明]

● 书 讯

陈颖《苏轼作品量词研究》出版

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陈颖所著《苏轼作品量词研究》,最近由巴蜀书社出版。

本书对苏轼作品物量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,并以此为切入点,讨论了宋代动量词的有关情况。据刘志成教授《序》称,本书以苏轼作品的量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,是因为苏轼作品的语言是北宋中后期书面语的代表。本书是继刘世儒教授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之后的又一本量词断代史研究专著,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。本书量词分类的理论框架,汲取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书中对数十种代表语料中的量词进行了彻查,在文献上下了很大功夫,体现了一位年轻学者勤奋治学、努力探索的可贵精神。本书出版以来,已得到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。(大明)